

报馆旧踪 BAOGUAN JIU ZONG

报馆旧踪

郭汾阳 丁东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旧踪 JIU ZONG



报馆旧踪

郭汾阳丁东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旧踪
JUZONG

报馆旧踪

郭汾阳 丁 东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 <http://www.jxep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 120 号 330002)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装订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 636 号 330009)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24 开本 7.25 印张 插页: 2

150 千字 印数: 1 - 5245 册

ISBN 7 - 5392 - 3126 - 2/G · 3046 定价: 12.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20 世纪转眼就要结束了。这本小书讲述的却是本世纪上半叶的故事。但经验告诉我,当今的人物,心灵上可能拖着古老的辫子;久远的故事,却可能包含着前瞻的内容。笔者讲这些故事的初衷,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想回顾中国报业的一个重要传统:争取自由民主。中国报纸的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邸报,但那毕竟是官家的专利品,与民间无缘,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众传媒是两码事。所以,追怀争取民主自由的报业传统,只能追溯到近代报业的兴起,追溯到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后的故事。20 世纪的中国报业大体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革命的传统,一个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传统。这两个传统虽然有差异,在挑战古老的专制统治时,曾经是携手并肩,在某些人身上是一身二任的。在本世纪初到 40 年代发生的许多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面对皇权的禁锢,面对军阀的专横,面对敌寇的入侵,争取民主自由和变革社会曾经谱写成一曲曲激动人心的交响乐。比如,在抗日战争中,有多少无党无派的报人,和多少身为共产党员的报人,共赴国难,同仇敌忾,奏出时代的强音。但是,到了 50 年代,这两个传统的差异凸显了,分道扬镳了。在很长时间内,讲到现代报业的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这方面的书出得很多很多。有关争取民主自由的传统,则不仅仅不能正面宣传,还要当成负面的东西来批判。代表这种传统的报人,有的靠边站,有的戴帽子,有的留在新闻岗位上,也不得不自我检

讨,自唾其面。从“反右”到“文革”,一次比一次严酷的运动,活生生把一个好传统人为地中断了。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展到“文革”中的一言堂,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独断论的新闻观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传统失去争取民主自由传统的参照,也走到自己的反面,殷鉴不远,值得深思。本书不是系统的专史,只是钩沉一些有趣的掌故,期望通过这些零星的掌故,让读者感受到一点老报人为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风采。笔者也希望,21世纪的中国报业,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和健全,因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将焕发出更为蓬勃的生机。

目录

前言	(1)	楼上佳人老《申报》	(44)
梁启超与少年毛泽东	(1)	披露《田中奏折》	(46)
太炎风采	(3)	《大公报》的报格	(48)
蔡元培巧卖《警钟日报》	(6)	“学习张季鸾”	(50)
“竖三民”三起三落	(8)	张季鸾的“三骂”	(52)
宋教仁遇刺	(11)	革新《小公园》	(55)
给一个人看的报纸	(13)	萧乾编《文艺》	(57)
岁寒而后凋	(16)	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60)
邵飘萍的影响	(18)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62)
义伶壮举	(21)	王芸生的失语	(64)
“萍水相逢”	(24)	范长江的崛起	(67)
林白水办报	(27)	范长江的遗憾	(70)
一个嘴巴和两个副刊	(29)	营救七君子	(74)
慧眼识少年	(32)	成舍我和他的“大菜台”	(76)
陈布雷的终身遗憾	(34)	孤岛上的新闻界烈士	(79)
“畏垒”如何浇块垒	(36)	廖家的悲剧	(81)
中国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39)	子冈妙讥“哈哈孔”	(83)
一百万兵与一百万读者	(41)	砍樱桃树的故事	(85)

曹聚仁这个人	(87)	顾执中两件得意之作	(127)
《现代评论》的发刊词	(89)	《中央日报》“为共党张目”	(129)
《公理日报》的梦	(91)	孔祥熙与《时事新报》	(132)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94)	说《展望》	(135)
最是文人不自由	(98)	从容就义的《周报》	(137)
山城唱和起风波	(102)	最后一个铜像是《民主》	(141)
智多星陈翰伯	(106)	彗星闪耀潘静远	(146)
恽逸群的“心有三用”	(108)	人言可畏说记者	(148)
炸弹·手臂·水果·监牢	(110)	一赵三张多风姿	(151)
《文汇报》复活	(113)	储安平放弃《客观》周刊	(154)
给你 10 亿要不要	(115)	《观察》的风度	(156)
胡政之起用徐铸成	(118)	储安平的办事风格	(158)
话说徐铸成	(120)	报纸的题目	(160)
徐铸成的标题艺术	(123)	《新路》的故事	(161)
《新民报》的邓大姐	(125)	报人的天职	(165)

梁启超与少年毛泽东

梁 启 超 与 少 年 毛 泽 东



梁启超

毛泽东 16 岁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后来他回忆:“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的文章,尤其梁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斯诺《西行漫记》)。

当年,不止是毛泽东,多少青年知识分子为梁启超独具魅力的报刊文字而倾倒。梁启超号任公,社会风行“任公体”,毛泽东有一个笔名“子任”,就是这么来的。



毛泽东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新闻业开山之祖”。他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若论其“量”：“任公生平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矣,著述累积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张其昀《梁任公别录》);论其“质”：“则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语)所谓“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梁启超的文字“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谈时则摄魄忘疲,谈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吴其昌《梁启超传》)。这些自然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初次“发表政见”时,毛泽东便将中国新政府的理想组成人选定为:总统孙中山,总理康有为,外长梁启超。在湖南一师,他还编印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组织团体“新民学会”,又分明是梁氏《新民说》的影子,从《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和他后来的文章中,也多少可以看出梁氏对他的影响。

在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是把梁氏归为“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党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为了激励全党的“跃进”,他还印发了梁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苏报案”实录》等等,在梁氏早已愧疚于“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之后,毛泽东也早已是“还看今朝”了。

太炎风采

太炎风采

鲁迅晚年评说其师章太炎先生，认为他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那就是“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报案”——“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同上）。

《苏报》是上海陈梦坡主办的，它与“中国教育会”携手，由该会会员及“爱国学社”社员供稿，《苏报》则资助“爱国学社”，蔡元培等每天为他撰写评论，于是《苏报》成为反清党人的机关报，“排满兴汉之激烈议论，高唱入云。全国骇目，引起官场之忌”（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遂下拿办密谕。清廷拿办党人，上海总领事首肯签字，但租界工部局却以政治犯例应保护，不肯执行，只是传唤暗示被拿人如蔡、章、邹及吴稚晖、陈梦坡、宗仰等速速离去。接着，两江总督魏光燾派道员俞明震来查办，党人星散，蔡走青岛，吴赴欧，陈赴日，宗仰避居哈同花园，独太炎不肯离去，并嘱邹容不必去，说：“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已第七次矣。”（蒋竹庄《章太炎先生轶事》）

有人说：“没坐过牢，不是好记者。”不单记者，即便学人，也要有“出研究室就入监狱，出监狱就入研究室”（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的气概。今天的青年人是很难想象当年求道者的“迂”的：谭嗣同不避斧钺，当走不走，掷地有声：改革要流血吗？“有之，请自嗣同始。”章太炎也当走不走：“志在流血，

焉用逃为”。“邹容毕竟年少，心志不定，自后门遁地去”，太炎“自狱中作函告诫之，令自行投到”，而邹容竟亦“自行投到”。当时《申》、《新》各报，多持反对论调，《新闻报》尤其讥笑章太炎太“愚”。太炎自狱中作书回答时，有“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休矣《新闻报》记者，请看数百年后，铜像巍巍高出云表者，我为尔，无特预决”（同上）等语，太炎先生真是慷慨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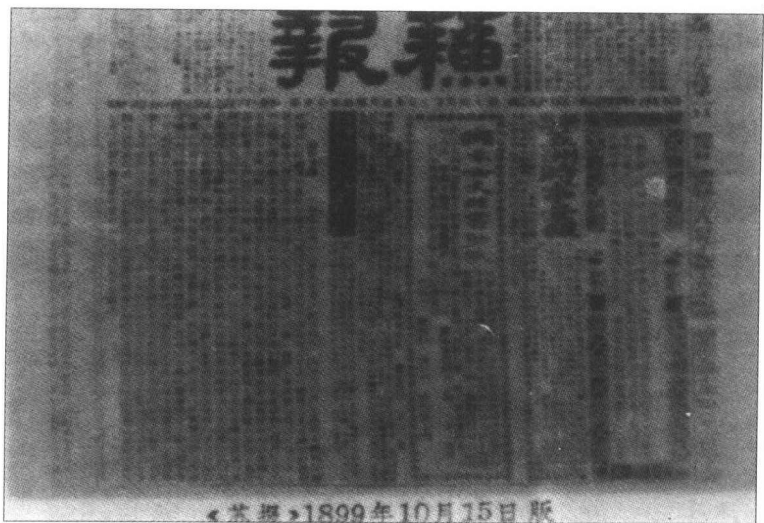
因“苏报案”，章太炎、邹容在上海住西牢，开审时原告居然是中国政府，由两江总督魏光燾代表，聘英人为律师，而裁判官为英国领事。“原被两告，不伦不类，至为可笑”，最后又由北京外务部与各国公使会议，确定监禁3年。章太炎说：“此事真奇，外部掌外交，民刑事自有主官衙门，定罪乃烦外部，判定中国人事，乃烦外国公使判决，真奇。”（张篁溪《章太炎先生在狱佚闻录》）

晚清“怪现状”很多，清廷箝制舆论无奇不有，只是这“苏报案”却传为笑柄：政府在“国中之国”中与公民打官司，洋人律师，洋人判官，已经滑稽之至，又指控罪状、摘取《苏报》论说及太炎文章语句，“顾此类语句，在中国视为大逆不道，译成英文，亦平淡无奇”（蒋竹庄《章太炎先生佚事》），如“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只好译为“我等之意，欲逐去满族，以表示中国国民之意”。太炎的妙语“载湉小丑”，也译为“载湉小贼”，说皇帝是“小丑”，在中国观念自然是大不敬；称呼“小贼”，洋人却不以为怪，加上章、邹正色辩论，滔滔不竭，会审诸公竟无计可施。清廷设计引渡，租界方面不允，从而生出了章大哥、邹小弟的许多故事。章太炎曾写《狱中赠邹容》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糍。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这些诗作，流传很广。鲁迅先生都很“感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太炎在西牢被罚苦工，只做裁缝、烧饭。裁缝是缝补袜底，烧饭只为犯人称饭，可以“偷饭”，太炎得此“肥缺”，“他犯人皆极羨之”。邹容则不如太炎神色笃定，“容色甚悴，若病若癯”，后以病重，“已许某日某时出狱矣，先一夕服医生药，遂死，故外间生疑，多谓遇毒”（张篁溪《章太炎先生在狱佚闻录》）。



苏 报

章太炎此前编著革命书报，最有名的有《诰书》、《复报》月刊、《国粹学报》、《苏报》等，出狱东渡后，加盟同盟会机关刊《民报》，又被东京巡警总厅查禁，他就到地方裁判厅起诉，虽理胜而事不能胜。当时，太炎先生有几句提问，令裁判长一时语塞：

“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

“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摇惑人，使出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

“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同上）

“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慕仰太炎先生，是有原因的。

蔡元培离开南洋公学总教习一职后,为民主革命奔走,正逢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在上海办起《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作为拒俄团体的言论机关报,宗旨是“唤起国民,警告通国,实行拒俄”。

可是这家报纸的发行却不尽人意。因为该报在上海棋盘街竞进书社名下,书社的老板虽然同情蔡元培,但资金有限,不能供给应有的费用。《警钟日报》作为民主革命的阵地,呼唤国人面对日俄战争猛省,又译载俄国虚无党的事迹,以无政府手段倡导革命,不但广告少,一般市民也敬而远之。后来有一天,绍兴同乡来看蔡元培,向蔡献计,让一位同来的绍兴工友背一面旗,上面书写劝国人注意日俄战争的标语和漫画,一边敲锣,一边吆喝,以引起路人的注意。于是上海南京一带就经常出现这位绍兴工友的身影,那份报纸也比平常多卖出一二百份。蔡元培十分高兴,说:“真弗错气!真弗错气!”(绍兴话,意“真不错”,见马鉴《纪念蔡子民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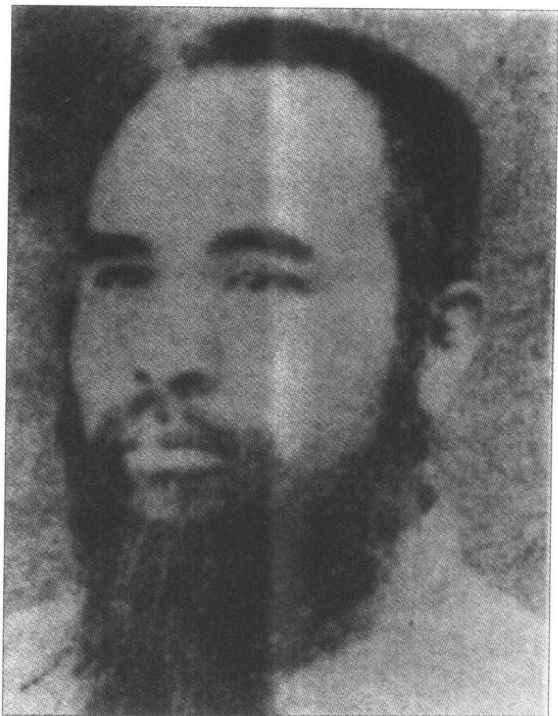
“竖三民”三起三落

“竖三民”三起三落



民
立
報

斯诺在陕北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娓娓叙述个人往事,在16岁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得见表兄文运昌送来的刊物《新民丛报》后,翌年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的译本把《民立报》误作《民力报》



于右任

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逢先知写的《毛泽东读报章杂志》一文误为《民主报》。辛亥革命前后,于右任继《神州日报》、《舆论日报》之后,自己创办的“民族革命的报纸”便是声名赫赫的“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那时毛泽东还未见过《民立报》前身的《民呼》、《民吁》,因为这两张报纸相继已被迫停刊了。

《民呼》宗旨是“为民请命”,揭露时弊,揭发各省吏治腐败。这就不能不提及湖北提督张彪。张彪原先不过是山西榆次一个无赖,给山西巡抚张之洞做马弁,善于献媚,张巡抚将一位丫环赏给他为妻室。后来张彪因缘发迹,作了湖北提督,湖北人不满其暴政,奉赠其浑号为“丫姑爷”。《民呼》不加忌讳,揭露其人。张彪就向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控告《民呼》侮辱长官,逼令逮捕主笔,查封报馆。被《民呼》抨击最力的陕、甘官吏也极力要求查究,《民

呼》终以“毁谤名誉”被封门，社长于右任与主笔陈飞卿也身陷囹圄。后同盟会遣景耀月等赴沪，营救于右任，出版《民吁》。前“呼”后“吁”，就是针对张彪的狂言：“以后谁敢当主笔，就把谁的眼睛挖掉”。那么好吧，不劳你大驾，我们自挖双睛，“呼”便成了“吁”，虽然“失去”两目（“呼”字两点），依然“为民请命”，且“呼”且“吁”，不稍减色。

《民吁》后来也以宣传反日，被日本领事照会清廷予以查封，清廷居然在没有原告（日领事拒作原告），也不予辩护的情况下，判决《民吁》永远停刊。封门的时候，人们悬“吊词”于报馆前，“竟有燃香烛痛哭者”。

第二年，于右任、宋教仁、章士钊等再创《民立报》，其宗旨又是“为民请命”——“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月灭”。《民立报》宣传民族革命，激励民气，笔伐窃国大盗袁世凯，再遭袁氏喝令淞沪警察厅“禁止售卖”，终于，《民立报》也被迫停刊。

“在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于右任先生应是第一人。他1907创刊《神州日报》，失败后，绝不气馁。1909年创刊《民呼日报》，5月出版，3个月就被租界当局查封。10月间，他又重整旗鼓，改名《民吁日报》，重新出版。不过出了1个月零10天，又被封闭。翌年10月，他又与宋教仁创刊《民立报》，继续宣传民主革命。那时，租界内外民气更盛，租界当局有些害怕，不敢轻于下手。”（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于右任的执着，同时也可看出清末政权的新闻管制并不严密。再加上当时办报容易，用不了多少经费，编辑部有一两个助手，两三个校对，找一个印刷厂印，雇一些报贩卖，就可以出报。所以于右任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办报。

辛亥革命爆发后，战事正酣，交通中断，清军水陆并进，企图攻占武昌，在胜负未定、前景不明之时，上海其他报纸态度暧昧，只有于右任在《民立报》上歌颂武昌起义，乐观展望革命必成之前途。后来，于右任做了大官，还是觉得“《民立》余馨更可思”。他所留恋的，还是报人生活。

与“竖三民”并称的，还有“横三民”，即戴季陶的《民权报》、吕志伊的《国民新闻》、邓家彦的《中华民报》。“横”、“竖”，都是当时言词激烈的报纸了。